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应对

(北京) 刘建萍 周金鑫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九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九一八事变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站在中国与世界格局变动新视角分析九一八事变及中国共产党对抗日走向的重要影响，就能看清中国共产党坚守彻底反帝立场，坚持抗日反对投降，根据国际国内局势的新变动创造性地将局部抗日发展为全民族抗日的历史性贡献。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与世界格局新变动的标志性事件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发动的一系列侵华战争的起点，是中日民族矛盾不可调和的标志性事件。从日本帝国主义接续发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华北事变、七七事变，证明了日本欲将整个中国变成独占殖民地的狂妄企图。“很明显的，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次占领东三省，完全不是偶然的事，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殖民地政策与中国国民党一贯投降帝国主义与勾结帝国主义政策的必然的结果”“满洲事变对于中国事变发展的前途将给予决定的影响”^①。

九一八事变是世界重大历史格局变动演进的转折点，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势力试图控制满蒙，进而独占中国、称霸亚洲

乃至世界的狂妄计划的组成部分，是打破“一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构建由日本主宰的“大东亚新秩序”的重要起点事件。从日本帝国主义激化日美矛盾、退出国联、实施自主外交、发动太平洋战争等历史事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称霸世界野心的膨胀轨迹。九一八事变成为中国反法西斯战争开始的起点。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中国抗日具有了复兴中国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意义。从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宣言和文告中可见其深刻洞见，诸如“这一事件将成为世界大战尤其反苏联战争的导火线”“满洲事变是瓜分中国为各个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的开始，是反苏联战争的序幕，是世界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②，等等。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及行动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亡国灭种的中华民族危机和“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逼迫所有政治派别必须用实际行动作出历史性回答。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亡大旗，发表宣战宣言，组织苏维埃抗日救国会，组织东北抗日联军战斗在东北第一线，发动一二九爱国运动等，成为领导局部抗战的重要政治力量。

1. 揭露日本侵略暴行及侵略本质。中国共产党迅速行动起来，密集发布一系列宣言电文，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分析侵略本质，



1931年9月18日，日军蓄意制造柳条湖事件的现场

号召民众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中共满洲省委战斗在抗日最前线，于事变第二天就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中共中央也先后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9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9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为日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9月30日），毛泽东、朱德等联合发表《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9月25日），中国日本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中央联合发出《中国日本共产党为日本强占东三省宣言》（9月20日）等。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每一次侵略事件，中国共产党都有宣言、纲领密集发布，揭露侵略事实，分析事件影响与进展，呼吁民众团结御侮。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相继发出《中共中央紧急通知》（1月27日）、《中共中央为武装保卫中国革命告全国民众书》（1月27日）、《中国共产党为上海事变第二次宣言》（1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2月2日）、《中共中央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的信》（2月15日）等文告，号召全国民众迅速举行“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以革命的民族战争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

2. 揭露国民党当局妥协投降面目及消极抗日言论。九一八事变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对日本实行不抵抗主义和“攘

外必先安内”的妥协政策。针对国民党当局出卖民族利益，幻想依赖国际联盟和美、英等国干预抑制日本侵略等种种事实，中国共产党予以及时揭露，呼吁民众丢掉对蒋介石的幻想。针对国民党“造谣说日本帝国主义帮助红军金钱与军火，污蔑中华苏维埃政府与日本军阀进行谈判”^③；或者说国民党不能出兵抗日，是由于苏维埃政权和中国工农红军“障碍抗日战争”，说“中国没有力量抗日”，故“不得不忍痛停战”^④等滥调，中国共产党充分揭露其言论的迷惑性、欺骗性，指出“中华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侵略的唯一的民众政权与武装力量，在历次英勇的战争中，证明中华苏维埃红军与任何帝国主义势不两立”^⑤。

3. 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对日宣战的实际行动，昭示抗日的彻底性和行动力。中共中央先后于9月20日、25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以中国各地苏维埃区域政府名义发表告全国民众书，谴责日本侵略罪行，表明抗日立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于1932年4月直接发布对日战争宣言和动员对日宣战训令，实施全体红军政治军事总动员与苏区群众总动员。随后发布《为对日宣战告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通电》，将对日宣战昭告全世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为九一八事变以来第一个对日宣战的局部执政政府。1932年6月23日至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举行苏区第一次反帝代表大会，成立中央苏区反帝总同盟，通过《反帝斗争纲领》。苏区成为抗日的先锋区域，成为引领全国民众抗日中心区域。1934年7月，中共中央及苏维埃政府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闽浙皖赣，沿途通过召开群众大会、张贴标语口号等方式大力宣传抗日主张，扩大红军政治影响，发挥了宣传队和播种机作用。到达陕北后又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东渡黄河到华北，争

取直接对日作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及红军以实际行动昭示了坚决抗日的决心、勇气与担当，为民众指引了抗日救国的正确方向。

4. 东北抗联谱写了党领导下的东北人民军队直接对日作战的不朽乐章。东北抗日联军（简称“东北抗联”）是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小型游击队，逐步联合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日山林队，哗变反正的抗日队伍组建起来的一支人民抗日武装。从1931年12月磐石赤色游击队创立，东北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队伍诞生起，中共东北党组织经过4年半的努力，打造了一支下辖11个军，总兵力最高达3万余人，后又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他们在白山黑水间英勇作战，主动出击，牵制日伪军于东北境内，扰乱日伪殖民统治，长期战斗在艰苦且残酷复杂的环境下。在中国抗战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东北抗联成为以人民军队身份参加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抗日武装力量，谱写了中国共产党军队直接对日作战达14年之久的不朽乐章。

中国共产党通过舆论、宣传及军事行动表明其与红军是抗日的先锋队，在全中国和全世界面前展现了维护民族尊严，为中国独立和世界和平英勇奋斗的先进政党、革命政府及英雄军队的光辉形象。

中国共产党推动局部抗战走向全民族抗战的创造性贡献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不断深入带来日益紧迫的民族危机，唯有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共赴国难，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取得民族解放斗争的彻底胜利。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引导各党派、各阶级、各军队、各民众凝聚抗战共识，将一切能动员的力量团结动员起来，逐步将局部抗日热潮发展成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并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忍辱负重，作出重大让步，展现出—个政党应有的担当与责任。

1. 以共同抗日凝聚团结共识。1933年1月，中国共产党最早发出红军愿意在共同抗日三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的呼吁。在《给满州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即一二六指示信）中明确提出：“建立包括上层在内的反日的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在给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另一封信中进一步提出反帝统一战线的7条行动纲领。193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新进攻告民众书》中呼吁：“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联合起来，在反帝统一战线之下，一致与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作战吧！”中国共产党以“共同抗日”凝聚团结共识，以建立包括上层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策略，顺应了广大民众意愿，符合民族大义，迅速获得部分爱国的地方实力派的响应。

2. 将社会精英爱国人士聚集在抗日旗帜之下。1934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公布《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并展开共同签名运动。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1779位爱国民主人士成为纲领发起人和签名者，聚集在抗日旗帜之下，并于同年5月在上海成立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总会。该《纲领》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是中国人民自救救国的唯一出路”，强调对日战争的正义性进步性神圣性；以全军总动员，全民总动员，全民总武装，保障抗日军费，成立总机关，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展开对日作战；以一切对中国人民武装抗日作战表同情援助或守善意的中立的国家和民族为朋友，这使革命力量进一步扩大和聚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和影响进一步扩展。不仅包括国内上下层结合的统一战线，而且包括了国际统一战线。

3. 推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走向全民族抗日轨道。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



密林中的东北抗日联军战士

发表《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强调全体同胞，特别是“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们”，以“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摒弃“旧仇宿怨”“分歧成见”，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号召“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以“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为口号的新政策获得了更多层面的宣传。由于认识到“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是实行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之必要条件”^⑥，中共中央先后于1936年5月5日、6月20日、8月25日发出《关于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共中央为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言辞恳切，倡议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口号下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并以建立全国普选的民主共和国，“苏维埃区域即将成为他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思想表达合作的诚意。毛泽东先后致信宋庆龄、蔡元培等进步人士，周恩来先后致信陈立夫、陈果夫、蒋介石等国民党要员，深切表达合作抗日诚意。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作出将苏维埃政府改为中华

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南京政府及军事委员会指导等保证。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利益顾全大局，最终推动实现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

4. 凝聚中华民族认同意识，树立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自信心。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华民族复兴”思想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中国共产党顺应潮流，以“大中华民族”“中国人”概念凝聚民族认同意识，树立全民团结御侮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自信心。“中华民族反日神圣战争万岁”“大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大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等口号成为号召民众树立民族认同意识和信心的重要标识。以“我们都是大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们的共同要求”和“神圣的义务”而呼吁各党派联合起来共赴国难。以反日战争的民族性全民性，以及正义性进步性神圣性唤醒民众树立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自信心。“我们相信一切愿意反对帝国主义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都会自动的参加这一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相信卷入全中国千千万万群众参加的民族革命战争，不但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能够战胜一切帝国主义！”^⑦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⑧，证明了“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⑨论断的正确性。中国共产党以抗战14年的历史证明了自己是中华民族利益的坚决维护者、捍卫者，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注释：

①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66、565页。

③④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

从五四时期三次主义论战

看李大钊的斗争精神

(北京) 郭曜辉 李雨西

100多年前，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派别展开了激烈辩驳，进行了彻底斗争，最终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尊严和地位。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斗争精神对于新时代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具有重大启发。

李大钊同三次主义论战的“情景再现”

20世纪初期在中国发生的三次主义论战，主要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论战”“无政府主义论战”。交锋中，李大钊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各种思潮和学说展开激烈斗争。

(一)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绝地反击”

1919年7月3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批驳社会上流传的种种“主义”之风。

8月17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此文一发，火药味浓烈，双方剑拔弩张，不久便开始了“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其分歧主要聚焦以下3个方面。

一是对“问题”认识的表象和本质。胡适反对人们谈论各种主义，认为只要一个个具体问题能解决，那么社会难题也将迎刃而解。因此，相比于谈论主义他更喜欢研究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李大钊则将胡适所提一系列具体问题分别归类于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等不同范畴，尖锐指出：“只有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此外，他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哲学观点出发，将社会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都归咎于经济问题这个根本点。所有问题都将随着经济问题的解决而得到化解，从而拨开层层迷雾看到中国社会问题的本质，有力地回击了实用派。

二是对“主义”认识的抽象和理想。胡适将主义看作是一个抽象名词，在《多研究

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4、251-252、164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83页。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0页。

⑧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69、565页。

(责编 刘慧)